

第12辑

1978纪事

反思中国·梳理往事

吴思◎主编

亲历记

革命信念与我的风雨人生 刘英

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 柳守忠

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严寄洲

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 李平

我为张学良将军送葬——将军的中共党员身份考略，阎明复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陈大斌

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陈模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吴江

小平批准我上大学 薛亮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二辑

1978纪事

亲历记

吴思◎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记: 1978纪事 / 吴思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203-06997-3

I. ①亲… II. ①吴…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5149号

亲历记: 1978纪事

主 编: 吴思

责任编辑: 赵虹霞

装帧设计: 思想工社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10-62164516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655mm×965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30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997-3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本书是《炎黄春秋》杂志“亲历记”栏目2000年—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这些文章所记录的，基本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人和事。这些文章的作者，也都是这段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的见证人。

这些亲历者们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还原了什么真相、采用何种视角、代表哪种利益、结论如何……这些，读者都可以去文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所亲历和记录的这数十载，正处在中国社会三千年来未有之最大裂变时期，无数惊喜和苦难都蓄积于时间之河，在这一瞬间倾淌而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被清晰地刻画进每一个人的生命。

拿“文化大革命”为例，除一人之外，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被轻易打入卑贱的炼狱，即便怀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美好信念，但任凭如何呼号、如何抗争、如何隐忍、如何迂回，也没有哪一个位卑者的“忧国”之心、“忧民”之举，能力挽狂澜，阻止国家的这一场惊天厄运。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位卑”必然是一种常态，“忧国”也成为了一种奢求，甚至变成别有用心之人的凶器。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位卑”现象正是民主与公平的缺失，是公民权利的孱弱，是对个人权益的绝对漠视。那场悲剧说明，如果在更广泛的群体中，每一个个体都有对“人”的权利的认知和争取，则必然能汇聚成巨大的民间力量，才能让那些庙堂之上“忧国忧民”者的呼吁有了可依托的根基，从而从根本上形成监督和纠错机制，实现政通人和。

当人的地位不再卑贱；当人的尊严不再被随意践踏；当人们有合理的途径去争取和保障个人权益；当民主和法制的精髓被吸纳进国家体制，书里那些不堪回首的悲剧故事就不会在我们身边重演。

愿国人不再卑微。



目录

斯人斯语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何兆武/口述 料峭子/文...002

革命信念与我的风雨人生 刘英...011

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 柳守忠...019

谢觉哉日记所记彭德怀几件事 余明华...031

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孟起...033

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叶永烈...045

我与李雪峰交往 吴象...061

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 丁丑...075

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严寄洲...080

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 余焕椿...093

目录

斯人斯语

张春桥追查“黑材料”的疯狂 马洪林...103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阎明复...115

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 曾彦修...128

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 李平...138

瞿秋白案复查纪事 陈铁健...145

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 纪希晨...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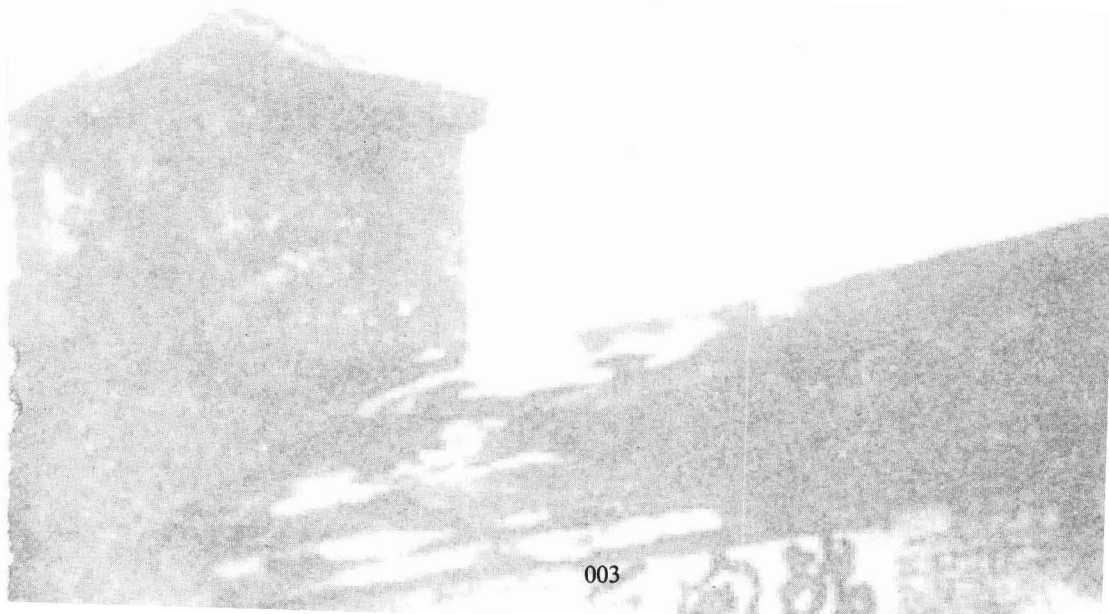
我为张学良将军送葬 阎明复...163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陈大斌...173

目录

我们的1978

- 我亲历的“四五”运动 鲁利玲...186
- 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 王仲方...195
- 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陈模...201
- 不从乱命引祸端 王生明...208
-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吴江...213
- 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郭楠柠...228
- 论文答辩受挫记 应克复...241
- 小平批准我上大学 薛亮...248
- 1992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 雷仲予...251





斯人斯语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何兆武/口述 科峭子/文

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书，但大多是资料集。比如北大出版社的《西南联大校史》，最后的修订我也参与了，可那本书我也不大满意，因为它都是资料数字，虽然也有用，但毕竟是死的，而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从1939年到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整整度过了七年，下面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不见得很正确，也不见得和别人的印象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活人的感受。

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往往特别突出政治斗争的一面。大学不是独立王国，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斗争里边去，这是不成问题的。可大学毕竟不是政治团体，并不是把全部的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争上，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学术方面。所以我看有些回忆或者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章往往会有两个偏颇：一个是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好像这成了大学里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就是尽量淡化政治斗争——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都是平等的，就不要强调政治，无论当初是反动的或革命的都不要提。这就像黄埔同学会那样，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官，好像都亲如一家，这也不符合实际。所以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过分淡化，两个偏向都不好。

一、“打倒孔祥熙！”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基础，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后来国民党来了，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告诫民众：“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所谓“错综复杂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纠正”这些思想，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之中。国民党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然，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适，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无间，即使后来在台湾，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提意见，请他下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战以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是北京有传统，像五四运动，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这些新的思潮都从北京发起。第

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本人压下来，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后来国民党撤退了，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到了抗战时



1945年12月1日，昆明国民党当局武装镇压反内战、争民主的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的师生，打死4人，打伤20余人，造成“一二·一”惨案。图为被袭击后的西南联大校门

期，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庆，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北方的几所大学都到了昆明，有搞运动的传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地方的特殊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且后来的学生运动规模变得非常大，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只有在1937-1938年，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台儿庄、徐州、武汉，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事不那么紧迫了，国民党由于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简直无法控制。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物资极度缺乏，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倒腾一点就能发财，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从1939年开始，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张奚若、闻一多等，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

1941年底的倒孔运动是由孔祥熙夫人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是个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中国香港、菲律宾、印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东太平洋，真是大出人们意料。国民党一点准备都没有，赶紧派飞机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运回内地。那天飞机飞回重庆，孔祥熙的夫人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被报纸曝了光。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没有出来，包括陈寅恪这样国宝级的大师，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义愤填膺，再加上平日积累的不满，结果一哄而起。

记得那天上午就贴出了大字报，中午，我和同学正在宿舍屋里聊天，忽然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们就都出来看，呵，果然聚集了很多。大家马上拿纸写字，然后找个棍子绑上，

举着就上街了。后来云南大学的人也出来了，昆明的中学生也出来了，浩浩荡荡，游行规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实就是针对蒋政权的，因为孔是蒋的人，当时是行政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游行回来后，大家都挺累的，我还记得一个同学说：“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气一样。社会不公正，国难期间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同时还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的一口多年来的怨气。

二、一多先生被刺

到了抗战的后期，1944-1945年，国民党已经不能够控制舆论了，虽然那时候民众并不了解马列主义，我们在学校里都不曾听说过有“毛泽东思想”一词，但青年学生普遍地反对国民党，要求民主，而且呼声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国民党也有个提法，叫做“清明政治”，搞了些民主选举，我记得街道上贴了个榜，写在上面的都是选民，包括冯友兰这些名人都榜上有名，让大家去选举，也算是做出了民主的姿态。不过那东西真是民主吗？我就不相信，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民主运动在昆明搞得挺热闹，这和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也有关系。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是地方军阀，不属于中央系统，双方总有利害矛盾，所以凡是反蒋的势力，龙云都多少采取保护的态度，凡是反蒋的运动，他虽然不公开鼓励，但也不怎么过问，这在无形中给联大的民主运动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所以学生运动在云南的七年中始终没有发生过“惨案”，没打死过人，也没怎么镇压，这在蒋统区中很少见。当然这和龙云自己的利益有关，所以抗战刚一胜利，蒋马上就迫不及待把龙云给“解决”了。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军队接收日本占领区，龙云的滇军被调到北越受降，然后又被调到东北，结果昆明的驻军就留下杜聿明的第五军。一天早晨突然搞了个戒严，把省政府给包围

了，所有电话线掐断，请他到重庆去做官。后来第五军和云南地方军队还有过小规模武装冲突，打了两三天，最后还是派何应钦和宋子文来调解，弄架飞机把龙云送到了重庆，名义上是去做军事参议院的院长，实际是挂个空名而被软禁。后来杜聿明被调到东北，换了关麟徵做云南警备司令，也是蒋的嫡系。国民党夺权以后，云南由蒋直接控制，他是要镇压民主运动的，可是昆明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所以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

抗战胜利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战危机，可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打内战，想把共产党消灭了，甚至于把龙云这样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灭了。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民主运动在重庆、昆明都闹得很厉害，后来上海、南京以及北方也都在闹。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四位先生讲话，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打得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我记得我的同学说：“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剿匪，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们十分激愤，把上课的钟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的开始。

这次罢课是最久的，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学校等于处在停顿的状态。12月1日那天跟军警——其实是穿着便衣的特务——对峙的时候死了四个人，三个学生，一个中学教师。尸体放在大图书馆里，昆明各界人士都来悼念，我和几个同学也去送花圈、送挽联。那时学校的主要领导都不在，梅贻琦飞回北京准备复员，蒋梦麟已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到重庆做了行政院秘书长，胡适当时是北大校长，但他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刚到昆明时，同学很欢迎他，学生代表去见他，他也慷慨激昂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学生，



▼昆明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为“一二·一”死难烈士送葬，闻一多（左三穿白衫者）等教授为死难学生致哀

就是打死我的子女，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态度还是好的。可是傅斯年基本上站在国民党一边，希望把这个事情了结，并没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那种民主斗争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1946年3月17日出殡那天，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全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而且社会各界都非常同情，我们转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也算是胜利。后来傅斯年回重庆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终于换了警备司令关麟徵。更重要的是，“一二·一”运动正式揭开了此后三年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即毛泽东所谓开辟了“第二战场”，国民党政府受到强大的内外夹攻，终于垮台。

刺杀闻一多是1946年夏天的事，李公朴先被刺，闻先生参加追悼会，上去骂了一顿特务，回家路上就被刺死了。当时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大概已经走了一半的样子，我走得比较晚。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

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立即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神态凝重。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呢，我不太清楚，不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三、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作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的大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经济系读书，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十三团团长江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时常到学校里抓人，我大姐就被抓起来关了一年，所以她本来应该1936年毕业，结果1938年才毕业。二姐何兆仪在北大化学系读书，她是地下党，“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宪兵十三团也走了，情况好一些。1937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抓起来关了十多天，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出来。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时候又说我二姐是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弄得她得了神经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解放后也一直搞专业，虽则不见得能有什么成绩，但无论如何最多只是个走白

专道路的帽子，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我的妹妹柯炳生（去解放区后改的名字，这在当时是普遍的）1942年入学，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积极分子。她和她的爱人萧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区，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不过她们的下场也都不佳。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拔白旗的时候她受命组织批两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线，刘到了第一线，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加之自然灾害三年饥馑，政治上缓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于是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杀了。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时候早晚也逃不过去的。

姐姐们熟识的那些同学如果继续革命，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有许多人是坎坷一生的。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质系的，后来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50周年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谈到我姐姐时，我说：“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说：“不能那么说，当时都是爱国。”这一点我也承认，当时都是爱国，可你应该适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个判断。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就得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凭当时的一股热情，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高两届，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届。李振穆学习很不错，而且我知道他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1941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级。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文革”开始时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我也去了，看见台上揪了六个人，这边三个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那边三个不大认得，可最后一个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就问旁边的人，他告诉我：“这个人是北